

商人自治体制在威尼斯的确立

雷恒军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 历史上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商业繁荣著称,而威尼斯人所创造的商业奇迹在体制上则归因于其独特的商人自治体制。商人自治体制在威尼斯的确立,从表面上看是威尼斯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背景下一个自然而然的的选择,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商人自治体制是威尼斯人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商人自治体制既给威尼斯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威尼斯共和国走向繁荣与富强的历史机遇。

[关键词] 威尼斯; 商人自治; 商业奇迹

[中图分类号] K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36(2014)01-0047-04

威尼斯显赫的声誉并非仅仅来自它那迷幻般的水城风光,威尼斯人创造的商业奇迹曾震惊欧洲——这个面积只有不到 7 平方公里的城市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从曾经的荒岛滩涂跃升为世界的商业中心和欧洲的首富之地,一度拥有全欧最强大的人力、物力和权势。弹丸之地的威尼斯,在其最鼎盛的 14~15 世纪,每年的财政收入达到 100 万杜卡特,这个数目超过当时的英国和西班牙全国的收入,与整个法国的收入持平。此外,威尼斯还拥有中世纪时期欧洲最强大的船队和舰队,到 14 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各式舰船数量达 3000 多艘,在威尼斯舰队中服役的士兵有 25000~30000 人。^[1]

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地区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城市,它们大部分是罗马对外扩张的结果,是统治某一地区的军事据点和政治中心,但是,中世纪时期成为欧洲最大商贸中心的威尼斯此时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岛礁。公元 5 世纪时期,日尔曼蛮族和匈奴人轮番入侵罗马帝国,居住在意大利半岛东北部威尼托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战乱陆续迁居到位于亚德里亚海上的一片岛礁之上,这里是众多河流出口的汇聚地,淤泥和沼泽使掠夺者不能随意到达岸边,特别是那片深不到两英尺,宽 20~30 英里的淤泥地区,无论是涉水还是划船,都是危险的。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环境不仅使得威尼斯群岛成为人们躲避战乱的理想之地,也使得日后建立于此的威尼斯共和国成为能够置身于欧洲大陆政治纷争之外的世外桃源。于是,意大利半岛上的许多难民不断涌向这里,威尼斯群岛上的居民越来越多,而至 7 世纪时,伦巴德人占领北意大利,使得威尼托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都移居到岛上。但是,作为躲避战乱理想之地的威尼斯群岛却是一个人类几乎无法生存的荒芜之地,不仅没有任何适合农耕的良田,甚至找不到能够建造房屋的坚硬地基。早期的威尼斯居民不得不先在水中或淤泥中打入无数的木桩,然后将房子建在木桩上,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威尼斯人终于掌握了在狭小的岛礁上建造房屋的技术。于是,那些看似“浮在水上”的宏伟建筑物鳞次栉比地出现在威尼斯的各个岛礁之上,而连接这些建筑物的要么是无数的木桥或石桥,要么是形形色色的

[收稿日期] 2013-12-02 **[修订日期]** 2013-12-12

[作者简介] 雷恒军(1966-),男,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与文化史。

渡船。

二

由于威尼斯群岛几乎没有耕地,迁居至此的早期威尼斯居民不可能从事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而必须从其他地区输入日常生活用品才能够维持生存,因此,在威尼斯,几乎所有的人都与商业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或是水手,或是工匠,或是资本持有者,或是商人”,即“所有的威尼斯人都是商人”^[2]。威尼斯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海盐,因此,威尼斯人最早的商业活动就是为亚得里亚海周边地区提供食盐,食盐贸易由此就成为早期威尼斯居民重要的谋生方式,使得他们能够在这些荒芜的岛礁上生存下去,“食盐贸易给威尼斯带来的收益不可胜数”^[3]。

但是,通过输出海盐来换回必要的生活日用品仅仅是威尼斯人投身商业贸易的第一步,后来,威尼斯自己生产的食盐已不能满足海外市场日益增加的需求,于是威尼斯政府就出面定购其他产盐处的食盐来增加供给,这也给威尼斯人提供了通过转手贸易获得商业利润的机会。威尼斯人从事转手贸易的商品主要是各地的特色商品或生活必需品,而贸易的区域起初仅限于亚得里亚海周边地区,后来发展到爱奥尼亚海,然后又扩展到拜占廷、埃及和叙利亚等地中海的港口。当时欧洲大陆上政治动荡,战乱不断,生产萎缩,商业凋敝,对外部商品有很大需求,但又缺乏通畅的输入途径,而拜占廷帝国这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鼎盛期,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各地商品的集散地,在富庶的拜占廷与商品匮乏的欧洲大陆之间从事转手贸易逐渐成为威尼斯商人的主要业务——“威尼斯船只把其东面和西面邻近的产品,如意大利的小麦和酒,达尔马提亚的木材,环礁湖的盐等等运到君士坦丁堡,然后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拜占廷的丝织品及珍贵的香料。”^[4]

转手贸易给威尼斯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商品就像自来水一样流过这座繁华的城市”^[5],而金银资本则流入了威尼斯商人的腰包里,威尼斯城逐渐发展成为地中海乃至欧洲最大的商贸中心。“威尼斯发展成为利凡特商品输入地这一地位,早在715年随易特普差同威尼斯和科思奇奥所签订的通商条约里已可看出”,而到11世纪时,诺曼诗人亚浦利亚的威廉已开始由衷地感叹“威尼斯的商业洪流已这样壮阔。”^[4]威尼斯本是位置偏僻、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的一片荒芜岛礁,一批难民为躲避战乱被迫住到了这个贫瘠无益的地方,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维持生活的途径,于是就驾着自己的船舶航行沿海各口岸,从而使这个城市成了全世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城里到处都有来自各国的人”。“在意大利遭受蹂躏破坏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的人却享受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不长的时期,他们的实力就大大增强,名声远播。”^[6]

三

威尼斯商业的繁荣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定居和经商,大约在7世纪中叶,威尼斯人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在名义上威尼斯仍隶属于拜占廷,被称作“拜占廷-威尼斯群岛”。9世纪以后,威尼斯摆脱了拜占廷的控制,获得了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早期的威尼斯人大多为罗马帝国的遗民,当他们在一片狭小的区域内重新组建自己的政府时,罗马的城邦共和制“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687年,威尼斯进行了首任总督的选举,第一任总督叫保罗·卢加·阿那法斯托。在威尼斯政府建立初期,为了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挑战,威尼斯人赋予了总督相对强势的权力,比如,总督职位是终身的,他有权召集会议,有权支配公益收入,有权任命法官和各区官员,还有权任命神职官员。不过,第三任总督波里齐亚佐·乌尔索的专权行为招致了人民的怨恨,并在人民的动乱中被刺杀,此后,总督的权力开始受到全方位的制约,威尼斯逐步确立了一套独特的商人民主自治体制。

大议会是威尼斯的最高权力机关,成员来自贵族,其主要职能是选举高级市政官员,如选举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十人委员会”成员,选举负责立法事务的元老院元老,并参与选举负责行政事务的总督等;元老院是威尼斯的最高立法机构,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颁布国家的各项法律,管理国家的税收与支出。总督是威尼斯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威尼斯人对总督的选举非常谨慎,制定了一套极其繁琐的总督选举程序,为了防止总督在实际执政过程中独揽大权,威尼斯政府还建立了一系列复杂的制衡机制,以约束和监督总督的权力。威尼斯所确立的这种民主共和制较之罗马的共和体制有相当程度的改进,各层机构互相牵制,使得任何个人的独裁专制企图都难以实现,也使得威尼斯避免了同时期意大利其他城市

普遍存在的党派之争,为威尼斯的社会稳定和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说,威尼斯的政治体制基本沿袭了罗马的共和制传统,威尼斯所采取的一系列防止个人专权的措施其实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威尼斯独特的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使得它的共和制度与罗马的共和制度又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公民阶层的身份背景完全不同。即罗马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和战士,而威尼斯公民的主体则是商人,并由此导致罗马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实际上实行了两种各不相同的法律和政策。特别是在涉及经济发展、商业贸易的法律和政策方面,两者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比如,重农是罗马的一贯传统,对可能动摇农业基础地位和威胁正常农业生产活动的商业贸易,罗马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限制和打击。相反,威尼斯政府则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扶持和保障商业贸易发展的法律及政策。

四

在西方传统的城邦体制或共和体制之下,公民阶层是国家的基石,而公民自治是最普遍的政治现象。具体到罗马共和国,农民是罗马公民的主体。早期的罗马公民每一个人都在田里辛勤劳动,即使是富裕的贵族和政府官员也不例外。罗马公民在共和国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不仅是罗马公民自治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也必然是其制定政治政策、社会管理政策时重要的参考坐标。频繁的军事扩张是罗马历史发展的突出特征,而罗马军队到处打仗的最直接目的,无非是强占别人的土地,而通过征服战争获得的土地则大多被罗马公民以各种方式占有。

相反,威尼斯群岛“孤悬”海上,几乎没有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可耕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来岛上避难或定居的人们不得不以商谋生,因此,几乎所有的威尼斯人都与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罗马社会对商业、商人的一些偏见或歧视在威尼斯根本不存在,“上至总督、下至平民百姓,都没有谁以从事商业为辱。相反,他们认为是体面的事”。在这种浓厚的商业氛围中,“威尼斯的大使与官员把报告商业情况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甚至威尼斯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督有时也亲自经营商业贸易活动,比如,总督拉尼利·扎罗在1268年逝世前,就卷入了不少于132项不同的商业事务中。”^[2]

此外,威尼斯是一个由和平移民组成的国家,不存在由被征服者构成的庞大奴隶群体,威尼斯还是一个历史极其短暂的国家,不存在根深蒂固的等级制传统,所以,除极少数从外部买来的家庭仆役仍保持奴隶身份外,绝大多数威尼斯人都是身份平等的自由人,也是公民。由此形成了威尼斯公民社会与罗马公民社会的另外一个显著的差别,即公民阶层不仅是威尼斯社会的支柱,也是其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

在威尼斯这个主要由商人组成的城市里,富裕的商人阶级从一开始就垄断了城市政府的管理,自12~13世纪以后,富裕的商人阶级开始“贵族化”,1297年通过的所谓“关闭法”,正式确立了一个世袭的商业贵族阶层,“这一阶层只占城市人口的一小部分,最多的时候只占5%,威尼斯政府开始转变成商业贵族的寡头统治。”^[7]威尼斯商人贵族阶级管理城市的出发点是维护其家族利益或集团利益,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这一根本目的,他们不仅要建立一个公平稳定的商业贸易环境,还要制订一套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良好的社会公共环境的建设与维护是他们私人利益的主要保障。15世纪的威尼斯诗人尼克罗·查诺就认为,威尼斯社会能长久稳定的原因在于其贵族寡头政府。^[8]仅次于商业贵族统治阶级的是广大市民阶级,在这一阶级中又可分为若干个社会阶层:原住市民阶层,担任各种政府公职的小市民阶层,以及“蒙恩”市民阶层等。

五

虽然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主要由一个封闭的商人贵族集团所控制,但是政府的很多岗位都是向广大市民阶层开放的,市民阶层的子弟都可以在政府开办的人文学院内学习行政管理技能,之后便可以进入政府部门担任各种公职。同时,“政府的运作的过程对广大的市民阶层是开放的,普通市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统治阶层传达自己的想法和主张”^[5],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民众参政的积极性,也使得市民阶层对共和国的政治不再陌生。此外,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示威或在城市中散播舆论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使政府的立法和各项行政措施能反映民众的实际利益需求。

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大多来源于土地,国家的统治阶级要么是大土地所有者,要么是土地所有者

的代表,于是,维护和保障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就成为农业时代几乎所有政府的执政目标。而威尼斯人在实践过程中所确立的商人占主导地位的共和民主体制,则是西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体制创新。因为在威尼斯的新体制下,商人阶级首次破天荒地成为支配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威尼斯政府也首次破天荒地将商业主导作为其基本的经济政策。而在传统体制下,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阶层的利益要么受到统治阶级的忽视,要么成为政府重农政策的牺牲品。在威尼斯之前,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阶级成为某一国家的统治者的先例。

就商人自治体制确立的过程而言,对中世纪欧洲产生深远影响的商人自治政治体制在威尼斯的确立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波澜不惊,以至于当时的威尼斯人和欧洲人都没有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体制变化。但是,威尼斯的商人统治者随后所执行的一系列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则使得所有的欧洲人都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威尼斯的巨大冲击力——威尼斯在短短的几个世纪内由一片人类几乎无法生存的荒芜岛礁发展成为中世纪时期欧洲最繁荣的商贸城市,传统社会对商人的偏见与歧视不可能动摇威尼斯政府维护商人利益的决心,周边国家对商业贸易活动所采取的种种限制或打击措施也不可能改变威尼斯政府积极发展商业贸易的基本国策。威尼斯人虽然也信奉基督教,但他们对基督教会谴责商业活动的种种言论则置若罔闻,对于罗马教会禁止高利贷及禁止与伊斯兰教徒贸易的一系列禁令,他们更是视而不见,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威尼斯人“处理任何事务就像教会不存在似的”^[9]。

总而言之,独特的生存环境使得商人成为威尼斯公民的主体,而威尼斯公民的商人背景又使得商业贵族在威尼斯的建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维护商人的权益、促进商业贸易的繁荣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威尼斯商人自治政府制定各项法律和政策的主导性原则。就商人阶层来说,毫无阻碍地从事商业活动,并从商业活动中获取最多的利润是每一个商人理所当然的利益诉求,而将商人阶层的利益诉求上升为国家的政策目标无疑是商人们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而在以农为主的传统社会里,这只能是商人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痴心梦想。但是,一个偶然的歷史环境,却使得传统社会中商人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痴心梦想在威尼斯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现实。

[参 考 文 献]

- [1]波梁斯基. 外国经济史[M]. 北京大学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58: 345.
- [2]朱映红. 论影响威尼斯商业兴衰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 [3]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三卷[M]. 顾良,施康强,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121.
- [4]汤普逊. 中世纪社会经济史[M]. 耿淡如,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400-403.
- [5]尚洁. 从“威尼斯之谜”看共和国的政治体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6(5): 680-686.
- [6]马基雅维里. 佛罗伦萨史[M]. 李活,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3.
- [7]彭俊. 威尼斯宪政体制初探[J]. 法制与社会, 2008(8): 194-196.
- [8]Denys Hay. 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1380-1530[M]. Longman Inc, 1989: 261.
- [9]亨利·皮朗.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 乐文,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64.

[责任编辑: 朱 飞]